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门阀士族 与文学总集

刘跃进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古文学研究
ZHONGGUWENXUEYANJIU

主编◎范子烨

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

刘跃进◎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上海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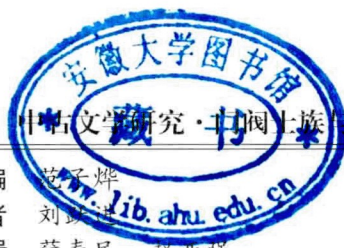
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刘跃进著.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2014. 6

(中古文学研究/范子焯主编)

ISBN 978 - 7 - 5100 - 8147 - 7

I. ①门… II. ①刘… III. ①永明体—研究 IV. ①I207.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9007 号



主 编 范子焯
本册著者 刘跃进
责任编辑 薛春民 赵亚强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85 号
邮 编 710003
电 话 029 - 87214941 87233647(市场营销部)
029 - 87235105(总编室)
传 真 029 - 872796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天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40
字 数 600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0 - 8147 - 7
定 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中古文学研究》编辑出版委员会

编委会

顾 问 许逸民

袁行霈

主 编 范子烨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琳(山东大学)

王永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朱晓海(台湾清华大学)

刘运好(安徽师范大学)

刘志伟(郑州大学)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苏瑞隆(新加坡大学)

周建渝(香港中文大学)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

胡 旭(厦门大学)

胡大雷(广西师范大学)

胡阿祥(南京大学)

侯长林(铜仁学院)
奚彤云(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公持(中国社会科学院)
曹 旭(上海师范大学)
康达维(美国华盛顿大学)
傅 刚(北京大学)
普 慧(四川大学)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栓才 孙延凤

副 主 任 薛春民

委 员 赵亚强 李一星 毛 蕊 白晓群 马可为 冀彩霞
唐娟莉 张博山 侯长庆 王 昭 薛 强 张 拓

校对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 欣 马志林 马志超 元文广 王少宁 车向东
王娅维 王 娟 王 静 毛 蕊 吕 洋 朱成英
孙晓喜 刘艳卿 刘蕴娇 张 拓 李一星 李小奇
李 成 李彦荣 李晓静 李 艳 李 莹 李朝艳
季桂增 屈雪琛 姚 艾 侯苍峰 茹 英 赵飒飒
赵珊珊 高春民 党翔宇 逯 宏 翟传鹏 薛 强

出版说明

“中古”这一概念源自西方,本特指西方封建制时代。一般以476年西罗马灭亡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其时限范围。晚清以来,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套用“中古”“近代”这些概念来划分中国的历史时期,但至于哪些朝代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期,史学界并未有一致的观点,或以秦汉至唐代为中古时期,或以汉末至唐代为中古时期,或以秦汉至清前期为中古时期;而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基本可等同于古人所说之“八代”,即上起东汉末年,下迄陈、隋,大体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之“中古”即是这个时代范围。此次出版的这套《中古文学研究》丛书主要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限,个别著作涉及范围扩至唐代。

本丛书作品虽主要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由于作者的不同学科背景、研究方向的差异,其作品风格、角度也不尽相同。有的属于“文选学”研究著作,如傅刚教授的《〈文选〉版本研究》和胡大雷教授的《〈文选〉诗研究》;有的属于学科交叉研究著作,如普慧教授的《中古佛教与文学研究》和胡阿祥教授的《中古文学地理研究》;有的属于“家族文学”研究著作,如刘跃进教授的《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和丁福林教授的《东晋南朝谢氏文学集团研究》;有的属于专体文学史研究著作,如王琳教授的《六朝辞赋史》;有的属于语言学研究著作,如王云路教授的《中古诗歌语言研究》;有的属于文学名著专题研究著作,如范子烨教授的《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除了以上单本专著,还有范子烨教授辑录的《中古作家年谱汇考辑要》(三卷)。我们力求全面、深入地整合当下

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最权威成果,通过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辐射中古时期社会的整体风貌。

本丛书中的某些作品是在作者以前著作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故而较为成熟。此次集结,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我们倾全社会之力谋划,并有幸邀请到范子焯教授担任丛书主编,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编审许逸民先生和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先生担任顾问。在范子焯、许逸民和袁行霈三位先生的通力擘画点津和各位作者的鼎力配合下,以及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下,这套《中古文学研究》丛书才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衷心感谢为这套丛书提供过帮助的各界朋友!谨以此丛书为中古文学研究界献礼!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编辑部

2014年6月

代 序^①

从唐代以来,当人们谈到六朝文学时,几乎无人使用“宋齐文学”的概念,而常把“晋宋”并称;也较少有人使用“梁陈文学”的提法,只是限于谈论“宫体诗”时,才把“梁陈”合为一谈。在绝大多数场合,人们总习惯于使用“齐梁文学”或“齐梁诗”的说法。在不少时候,“齐梁”几乎成了六朝的代名词。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大约和齐梁之际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大转折时代有关。这一点,当时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总集的编者,已经有所认识。例如,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两大杰作——《文心雕龙》和《诗品》,都产生于这个时代;而现存最完整的文学总集《文选》,其成书年代亦与此相差不远。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接连着这三大名著,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更应注意的是,《诗品》所评论的作家,截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年)沈约逝世为止;《文心雕龙》论文学,着重评论自上古至刘宋的变迁,而对齐代文学只是在《时序篇》中空泛地说了几句颂扬帝王的话,其实是存而不论;《文选》的选录作品,基本上也只收录到沈约以前的作家为主,只有三个作家的六篇作品是例外。但这些作品中有五篇皆可考定为天监十二年(513年)以前所作;仅一篇尚难确定,但作于天监年间则无疑(详见拙作《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不管锺嵘和萧统的以天监十二年(513年)为断限也好,刘勰的以宋末为断限也好,他们总是把南齐的“永明体”创始人王融、谢朓和沈约的出现作为文风转

^① 本文系先师曹道衡(1928—2005)先生为拙著《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所作序,兹再以此作为本书之序,以寄托我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变的标志。所不同的只是钟、萧把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刘则认为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不管刘勰、钟嵘和萧统的文学观有什么不同,但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对文学史上这个大转变时期作出总结和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从历史上看,每一个转折时代的大作家,都大抵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往往既是前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又是后一个时代的开风气者。以谢朓、沈约为例,在他们的代表作中,既受了建安到鲍、谢诸家的深刻影响,也为唐人导夫先路;他们另一些作品,也开启后来“宫体诗”之端。近人骆鸿凯先生在《文选学》中,把班固、张衡、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等人和梁代的柳恽、吴均等对立起来,认为《文选》所录,“高文典册十之七,清辞秀句十之五,纤靡之音百不得一”(第32页)。“永明体”作家的诗文,在这里显然应属“清辞秀句”之列。《隋书·文学传序》是唐代官修之史,其论六朝文学时,对梁代天监以前作家都作了很高的评价,而对梁后期文学则加以严厉的指责。在这种影响下,唐代应进士科考试的人,无不以《文选》为典范,甚至乡学之中也讲《文选》(见唐张《朝野僉载》);到宋代还有“《文选》烂,秀才半”(见陆游《老学庵笔记》)之语。可见齐梁之际的文风,实际上影响到了千余年以来的文风。

所谓“齐梁之际”文风的代表人物,实即指南齐永明年间出现的文人集团,其中包括王融、谢朓、沈约,也包括另一些著名文人如范云、任昉和陆倕等。这些人物虽大部分死于梁代(只有王融死于永明十一年,谢朓死于齐末),但绝大多数都成名于南齐永明年间,并曾入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府邸,同为“竟陵八友”中的人物。这些文人所聚集的竟陵王“西邸”,既是永明政坛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在这里出入的除了文士之外,还有很多名僧。萧子良和这些名僧曾创梵呗新声于此。在这同时,名士周顒遂创“四声”之说,而沈约则很快地把这学说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去,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永明体”和“声病说”,后来流行了千年以上的“近体诗”,正是由此导发的。随着“声病说”的兴起,不但诗歌,连辞赋、骈文等也发生了显著地变化。这种变化不光表现在讲求声律一个问题上,而是使诗、文和辞赋一变过去的典雅古奥之风,而逐步趋向平易和流畅。这种转

变显然与《南史·王筠传》载沈约述谢朓语：“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是相合的。但谢朓此语，却又令人想起了《大子夜歌》的“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作为中原高门出身的谢朓在艺术趣味上竟和南方的“街陌讴谣”的观点相一致。再就音律问题而论，吴兴沈氏的沈约采用了汝南周氏的周颙所创的“四声”说，并以此指导创作。不但如此，历代所用的韵书，其源也多肇自沈约。正如清人牟应震所说：“四声之分，始于周颙，而切韵类谱实始于沈约，则今之所行即沈本也。”（《毛诗质疑》，齐鲁书社，第369页）沈约所分的韵部，虽以当时朝廷中流行的语音——西晋的洛阳音为基础，事实上却已经夹杂了不少吴音。举例来说，在现在所见的《广韵》等韵书中，“西”字均归入“齐”韵；而在汉魏古诗中，它却与“真”、“文”、“寒”、“元”、“删”、“先”等通叶，并且直到刘宋袁淑的《效白马篇》中还是这样。然而在《神弦歌》等南朝民歌中，“西”字早已入了“齐”韵。这种从语音到艺术趣味的变化，到处都显示了当时中原士族与南方土著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但使地域的偏见趋向泯灭，也使原来的门第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南方的士族而论，在陆机的《吴趋吟》中说：“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四姓”即朱、张、顾、陆四家，而吴兴沈氏则还算不了什么著姓，直到晋宋之际，还不过是一个“武力强宗”。但自从刘宋的沈林子、沈庆之等人显达之后，锺嵘在《诗品》中已把沈约和王融、谢朓，并称“贵公子孙”。这四字出于颍川钟氏的人手笔，更反映出人们观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所以“永明文学”的出现，不光是多种意识形态方面发展变化的共同结果，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变化造成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现实”应该包括很多内容，不能局限于前一段时间所仅仅着眼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我们在从多种社会因素来解释“永明文学”这一文学现象时，还必须紧密地联系到“永明文学”本身的特点，论述和阐明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刘跃进同志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就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这部专著的一大特色就是避免了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论述文学发展的原因时，只是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基础的原因而忽视种族、区域文化等重要因素。在这部

专著中论到永明文学产生的原因时,就紧紧地扣住所谓“竟陵八友”的活动。把他们的出现和南北士族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联系起来,把他们和当时的政局、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目录学等各种文化领域的变化联系起来。这就使他对社会存在的论述和关于文学发展本身的研究融为一体,毫无机械拼凑之感。更主要的则是从“竟陵八友”在学术、志趣和性格方面的相同或相似来论证这个集团出现的必然性。这样,对东晋南朝的“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的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以及原来的“士”、“庶”界线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升降变化作了深刻地分析。这种论述有很多是独到的新见,发前人所未发,使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关系有了更细致和深刻地认识。

但是刘跃进同志的研究并不到此为止,他进一步从“永明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特点方面对“永明体”几位创始人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作了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例如:关于谢朓、沈约的诗歌,我们经常论到的往往是“大江流日夜”或“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和“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或“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等名句,而忽视了他们另一些作品。在本书中,则进一步论到了他们一些咏物诗,指出其“开拓诗歌题材的新领域”的贡献;还注意到了像沈约的杂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这些使人对这些作家的理解更为全面深刻,使人耳目一新。尤其可贵的是刘跃进同志对王融、谢朓和沈约的许多诗,在平仄声律方面作了细致地研究、分析,统计其入律之句和特殊律句的大量例子,指出两种句式的不同作用。特别有意义的是,根据他的统计,在三人中入律句最多的是谢朓,其次才是沈约和王融。这与我们经常想象的“声律说的倡导者是沈约,其中合律句应以沈约为多”的想法是大有区别的。

刘跃进同志所以能取得这许多成绩,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不但有比较深入和宽广的思路,而且能够刻苦地钻研历史文献,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的这许多独到之见,无不是建立在《永明文学系年》及对永明作家的大量作品进行逐字逐句的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言必有据,不作空谈,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和优点。

在谈到本书的这些特点时,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回忆起当年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先师游泽承先生多次教诲我们要认真读书,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但同时,游先生还特别对我指出,光是记诵材料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新的思维方法,掌握新的观点,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这些教诲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使我感到愧疚的是四十多年来,由于某些客观的因素,再加上自己努力不够,在学术上并无所成,有负师训。我没有能做到的,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比我年轻的同志身上。前年,我为吴先宁同志的《北朝文学研究》一书作序时,曾引用了一句成语:“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我衷心的祝愿。我们这一代人岁月蹉跎,没有能接好前一辈的班。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大量的新科学、新材料涌现在我们面前,跃进同志又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加上他的刻苦努力而且富于春秋。正如荀子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功是完全可望的。对此我充满着信心!

曹道衡

1995年4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导论 从《古诗十九首》到南朝文学	(1)
一、抒情方式的转变	(2)
二、独立精神的寻求	(9)
三、向内收敛的倾向	(19)

上编 士风与文风

第一章 从魏晋风度到兰亭雅集	(25)
第一节 从曹植“情兼雅怨”看建安时代的世风	(25)
第二节 魏晋风度的时代特征	(30)
一、德与才:高门与寒门的较量	(30)
二、药与酒:竹林七贤的选择	(31)
三、佛与道:东晋名士的追求	(36)
第三节 王羲之与《兰亭集序》	(42)
一、关于王羲之的生平	(42)
二、围绕《兰亭集序》的论争	(43)
第四节 兰亭雅集中的欢乐与无奈	(49)

第二章 “二陆”的悲情与创作	(52)
第一节 “二陆”的身世	(52)
第二节 “二陆”的性格	(57)
第三节 “二陆”的创作	(59)
第四节 《文赋》的意义	(63)
第三章 从隔阂走向融合	(68)
第一节 竟陵八友的形成及其性质	(68)
一、结交时间长久	(70)
二、才学冠冕当时	(71)
三、思想性格接近	(74)
第二节 竟陵八友在永明年间的文化活动	(80)
一、商讨学问 弘扬释教	(85)
二、诗歌创作	(88)
三、辞赋创作	(90)
第三节 竟陵八友的评价	(91)
一、促进南北士族的融合	(91)
二、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	(98)
三、引领士族命运的转折	(102)
第四章 永明文学思潮概说	(110)
第一节 永明文学背景	(110)
第二节 永明诗歌创作	(116)
一、宦游他乡,在山水景致中寄寓淡淡的愁情	(122)
二、离别酬赠,以委婉细腻的笔触抒写人间的真情	(124)
三、睹物兴情,开拓诗歌题材的新领域	(126)
第三节 永明文学思想	(128)

一、倡导平易自然的审美理想	(132)
二、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和谐	(134)
三、崇尚清新道丽的艺术风格	(136)
第五章 永明诗体辨释	(138)
第一节 永明诗体的内涵及其研究范围	(138)
第二节 永明诗体的句式辨释	(141)
第三节 永明诗体的律句辨释	(145)
一、入律句	(147)
二、非律句	(157)
第四节 永明诗体的用韵辨释	(164)
一、多押宽韵,也押窄韵	(165)
二、以押平声韵为主	(165)
三、押本韵甚严、押通韵多已接近唐人、转韵之诗应摈除在永明诗体之外	(167)
第五节 永明诗体的俳偶辨释	(170)
一、花鸟对	(171)
二、地名对	(172)
三、色彩对	(173)
四、服饰对	(174)
五、数目对	(174)
六、方位对	(175)
七、天文对	(175)
八、时令对	(176)
九、重叠对	(176)
十、副词对	(176)

第六章 永明声病理论的新探索	(180)
第一节 西域声病理论的传入	(181)
第二节 佛经转读与四声发现的背景	(186)
第三节 周颙与四声研究	(191)
第四节 “八病”四问	(197)
第五节 关于八病研究的思考	(207)
第七章 吴兴沈氏: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	(212)
第一节 吴兴沈氏源流	(212)
第二节 吴兴沈氏特点	(224)
第三节 沈约的振起	(227)
第八章 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235)
第一节 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	(236)
一、长安	(236)
二、洛阳	(238)
三、建康	(243)
四、凉州	(245)
第二节 四大文化中心交流的若干途径	(247)
第三节 文化僧侣的特殊作用	(258)

中编 《昭明文选》研究

第九章 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	(273)
第一节 昭明太子文人集团的构成	(274)

第二节	昭明太子文人集团的文学旨趣	(278)
第三节	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形成	(283)
第十章	有关《文选》“苏李诗”“古诗十九首”若干问题的考察	(289)
第一节	关于《文选》“苏李诗”的年代	(289)
第二节	《文选》“苏李诗”作者为庾信说纠谬	(294)
第三节	徐陵篡改《文选》加入“苏李诗”说的荒谬	(297)
第四节	“苏李诗”的年代为东汉前期说	(303)
第十一章	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	(306)
第一节	由“感甄说”谈起	(307)
第二节	李善注《文选》在唐代的流传	(311)
第三节	尤刻本之版本依据	(313)
第十二章	关于《文选》旧注整理的若干问题	(319)
第一节	《文选》的经典意义	(319)
第二节	解读《文选》的途径	(324)
第三节	《〈文选〉旧注辑存》的编纂	(331)
一、	李善辑注	(331)
二、	李善独注	(333)
三、	五臣注	(334)
四、	《文选集注》	(335)
五、	佚名古注	(336)